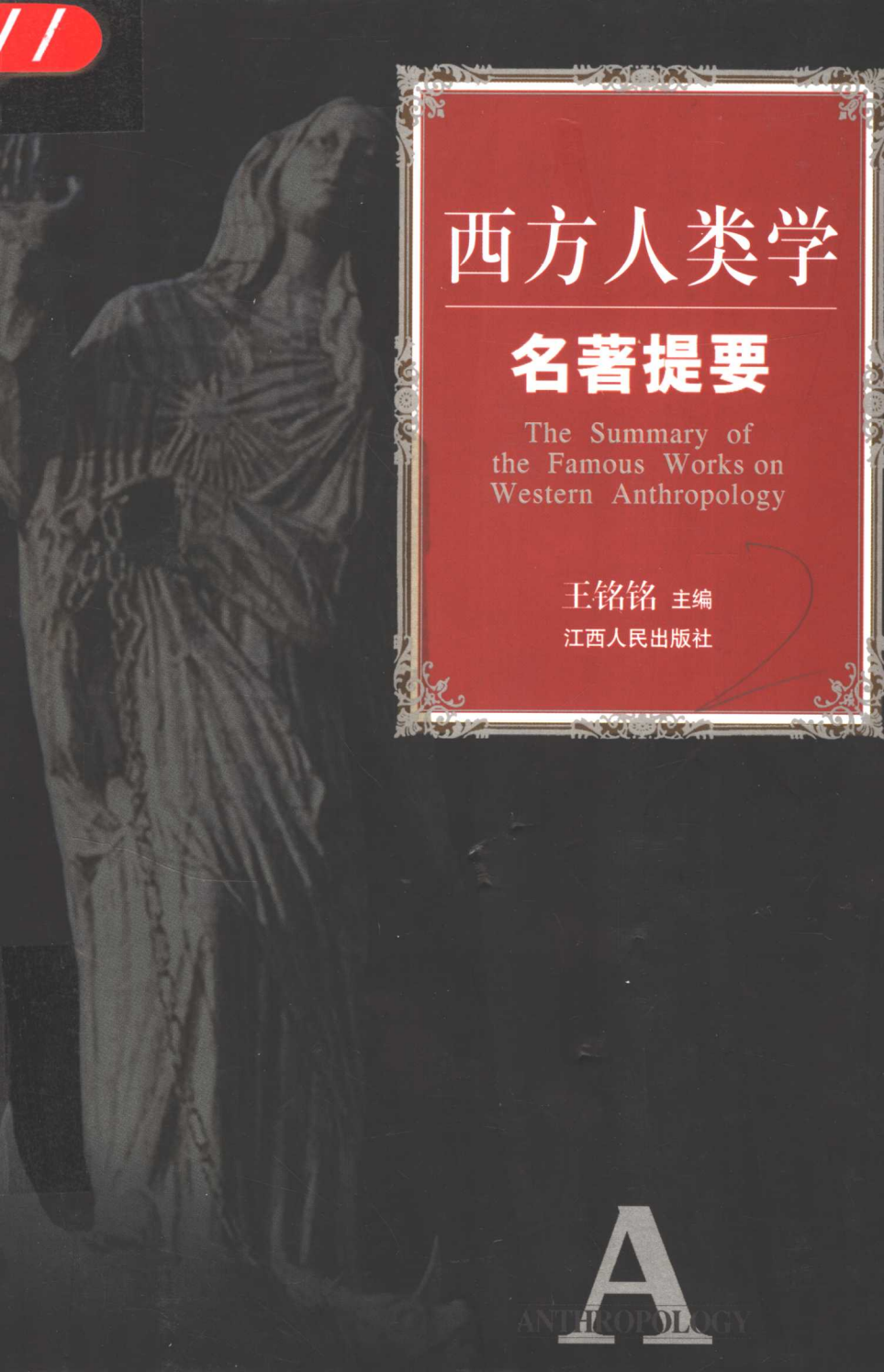




西方人类学

名著提要

The Summary of
the Famous Works on
Western Anthropology

王铭铭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A
ANTHROPOLOGY

C912.4
41

西方人尖字 名著提要

王铭铭 主 编
赵丙祥 副主编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638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王铭铭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5

ISBN 7-210-02897-8

I.西... II.王... III.人类学—著作—内容提要
—西方国家 IV.Z89: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520 号

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

王铭铭 主编

赵丙祥 副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湖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9.5

字数:490 千 印数:1-4000 册

ISBN 7-210-02897-8/C·70 定价:38.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王铭铭	
导论	1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	16
路易·摩尔根	
《古代社会》	29
路易·摩尔根	
《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	48
詹姆士·弗雷泽	
《金枝》	61
爱德华·韦斯特马克	
《人类婚姻史》	72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91
马塞尔·莫斯	
《巫术的一般理论》	109
马塞尔·莫斯	
《礼物》	124
吕西安·列维·布留尔	
《土著如何思考》	139
葛兰言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	150
布劳尼斯娄·马凌诺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166

布劳尼斯娄·马凌诺斯基	
《文化论》	179
布劳尼斯娄·马凌诺斯基	
《两性社会学》	186
弗朗兹·博厄斯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201
玛格丽特·米德	
《萨摩亚人的成年》	214
埃利奥特·史密斯	
《人类史》	225
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237
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	
《努尔人》	253
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	
《社会人类学》	262
卡尔·波拉尼	
《大转变》	272
莱斯利·怀特	
《文化的科学》	287
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302
爱德蒙·利奇	
《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	311

拉尔夫·林顿	
《文化树》	326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	339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	348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	360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	370
马克斯·葛拉克曼	
《部落社会的政治、法律与仪式》	385
路易·杜蒙	
《等级人》	400
玛丽·道格拉斯	
《洁净与危险》	409
玛丽·道格拉斯	
《自然的象征》	424
波得·沃斯利	
《号角即将吹响》	431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446
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	459

克利福德·格尔兹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473
克利福德·格尔兹	
《地方性知识》	485
马歇尔·萨林斯	
《文化与实践理性》	495
马歇尔·萨林斯	
《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	507
马歇尔·萨林斯	
《甜蜜的悲哀》	519
迈克·陶西格	
《南美洲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	527
埃里克·沃尔夫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546
约翰内斯·费边	
《时间与地者》	560
莫里斯·布洛克	
《从祝福到暴力》	572
布鲁斯·卡培法勒	
《人民的传说 国家的神话》	589
玛丽琳·斯特雷森	
《礼物的性别》	604

导论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在生命的存在链条上属于哪个环节？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中？人为什么总是用人自己的造物来界定自身的存在？怎样理解人这种“社会性动物”？为什么同样属于“社会性动物”的人，会创造出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文化？人与物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对人而言，文化与人性到底何者重要？……为了回答这些关系到人的自我认识的问题，人类学家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他们立足于琐碎的事物与抽象的思想之间，企求在一种对常人而言略显古怪的求索中探知人的本性。他们采集的资料常被其他学者视作细枝末节，而他们自己则坚信，在对细枝末节的观察中包含着某种关于人自身的宏大叙事。人类学家向来都称不上一个内在一团体的团体，在他们内部，无论价值观还是方法论都存在着鲜明差异。在学术争论以至几近谩骂的相互挑战中，他们针对“人的问题”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观点，为全人类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这样一门沉浸于存在的原野中的学问,是社会科学诸领域中——一门基础学科,它从一个有个性的侧面,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人——提出了重要看法。因此,了解这门学科,乃是了解社会科学之整体面貌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之一。《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以下简称《提要》)的主旨,是向读者介绍西方人类学家的代表作,意在使读者在把握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局部知识的基础上,初步了解它的思想演变脉络、理论革新概貌及方法转变过程,从而理解以这门学科的研究为天职的人类学家的主要关怀及思想视野。

西方人类学已有 150 年的历史。150 年来,西方人类学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回望这门被誉为“社会科学中思想最为解放的学科”走过的时间之旅,我们赞叹它的成就,为其代表人物的敏锐省思所吸引。在西方人类学史中留下过印记的人类学家,撰述了浩如烟海的论著,提出了纷繁复杂的观点。不同学派对于应汲取哪些思想养分来滋养各自的论点早已存在各种看法。在极端的情形下,一个学派选择的参考文献,甚至可能被其他学派视作累赘。就中国人类学界的情况来说,自 100 年前起,中国学者在引介西学的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随着学科状况的变化,这种本土特色又与本土学术的分化过程交织在一起,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力和甄别力。在学派林立、学术价值各异的情况下,要挑选出够得上“名著”这个称号的原著,并使《提要》符合本书主旨中许诺的目标,实在是一桩相当困难的事。从三年前接受稿约到现在,我们时时想到编这本书所要冒的风险。我们依据自己的一点认识,联系到了海内外同行的看法,在矛盾心态中,斗胆地做了现已“木已成舟”的书目选择。以下的文字,旨在说明这一选择的倾向与理由。

学科定位

对于一些(并非所有,甚至可以说只是少数)西方人类学家而言,理想上的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既包含着生物学的因素,又包含着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因素。作为综合学科的人类学,包括体质(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支派。体质(生物)人类学是从对人类身体素质演化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起初集中于研究人类化石证据和种族差异,后来又随着生物学的转变而与基因的研究融合起来。在文化人类学内部,又分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或称“民族学”)。考古人类学大都从事史前考古研究,对非西方文化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主要关注反映在物质文化当中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心态,也曾专注于人类创造和生活方式的阶段性变迁。语言人类学可分为“历史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类学家,或从语言和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历史入手,或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探究语言与“语言共同体”、语言与宇宙观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人类学既有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内分为亲属制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的,也有像美国那样在研究领域方面不加内部划分的。总言之,不同种类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旨在研究现存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政治行为、生产与交换实践与制度及对超自然力的运用方式。

在人类学的教育方式上,美国人类学侧重于坚持综合性学科的做法,而在欧洲,英、法、德等国的大学,则主要以社会(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为中心开展教学。欧洲拥有悠久的文明史,在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方面有深厚而独立的传统。而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人类学是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起步的,人类学家的研究广泛地涉及了“新大陆”的所有文化史

与社会形态,具有适合美洲文化研究的学科综合性。从西方人类学名著表现出来的时代风格看,早期人类学家知识渊博、学科综合能力极强。从20世纪初期开始,人类学研究则开始呈现出越来越专门化的趋势,社会(文化)人类学逐步占据主流。在过去的100年间,人类学大师的作品大多保持着对历史和现状的双重兴趣,也大多怀有对涉及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展开探索的雄心。但是,他们在研究和撰述中深受学科专门化潮流的影响,在具体做法上倾向于用扎实的专业研究,从个别窥全貌,以例证的叙述来阐述理论的含义。

在《提要》书目中所反映的人类学学科差异和变化,只能是局部的。在做书目选择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从事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家做出的贡献。选择原著清单是一项极易导致争论的工作。我们做这样一个选择,自然与我们从事的专业研究有关。但是,这也牵涉到我们对学科的认识。我们之所以决心让《提要》集中反映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代表性成就,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从这个侧面概述人类学的整体成果有其理由。人类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层出不穷。在一些时代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曾热切地接受来自生物学和语言学的“发现”。但是,从150年的历史来看,他们也一以贯之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在人类学中成为思想属于最为活跃、解释体系最具综合性的一派。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出了丰富的理论,使大多数名著中包含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手段无法脱离社会(文化)人类学内部的学术争论。社会(文化)人类学拒绝简单接受生物学对人的解释,主张从人与他的动物同伴的分水岭上展开人的研究。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积累了大量有关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论著,不仅为本分支领域的研究做了良好的铺垫,也启发了专门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在我们看来,要把握西方人类学的整体面貌,从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变迁入手,是贴切而又便利的。

历史概貌

在过去的 150 年中,社会(文化)人类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既存在一种学说替代另一种学说的情况,也存在新的理论回归于曾被认为过时的旧有理论而对之加以重新诠释的情况。学说变迁的这一复杂面貌给我们把握历史的努力增加了一定难度。在选择书目过程中,我们在观念上既采纳了上述学科定位方式,又试图表达一种对人类学学术思想的历史理解。怎样在自己的倾向性与所选原著的代表性之间作一个平衡?这是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面对的问题。为了避免使自己的倾向性冲淡《提要》的学科代表性,我们尽力客观地对待西方人类学 150 年来的成就,使《提要》能从局部窥见整体。

为了尽量清晰地体现变化的总体趋势,我们依据同行学者通常采用的分期方法,预先对这 150 年间学说变迁史做了如下几个阶段的划分:

1850 年—1914 年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初,是人类学建设教学、科研、社团、学术论坛的奠基时代。与 20 世纪上半叶相比,西方内部的和平得到维持,在市场经济与国际关系秩序中占据的霸权地位也相对稳固。整个世界依据西方与非西方、殖民与被殖民、市场与资源、文明与野蛮的差异,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格局。这个时代的西方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形成了分工:其他研究人的“科学”依据自然科学原理剖析西方社会内部的财政、市场及社会,而人类学则被定义为对非西方——主要是部落社会——的研究。西方人类学家,先是关注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他

们或在人类体质的进化的缺环上寻找关联线索,或在人类社会体系的进化的缺环上寻找复原历史的依据,研究成果的总结性报告一般都是针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写就的,其基本特点是历史阶段论的“臆想性”(conjectural)。

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几乎是同步提出的。在生物进化论中,达尔文在“存在链条”中揭示出动物与人之间的连续性,这对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人类学内部,早期的著名研究大多为受过法学训练的人类学家完成,他们所关注的主要制度是亲属制度,特别是亲属制度中关系的定义及传承。解释事实的理论框架大抵与近代西方科层主义有关。对于“野蛮人”展开的研究,依据“传统”与“近代”的二分格局,将研究对象限定于“近代化”的对象——历史与承载历史的“文化残存”的“野蛮人”。从表面上,由“臆想性的历史”推论出来的“野蛮人的特性”,是进化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实际上,大多数进化人类学家研究“野蛮人的特性”,意在揭示西方现代文明自身的特征、形成过程与构成原理。紧接着亲属制度的研究,到19世纪晚期,人类学家的关注点转向原始文化与原始宗教,力求在人的“精神领域”发现文化差异和历史进步的理由。

随着考古研究及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初步发达,19世纪末的人类学从进化论(evolutionism)转向传播论(diffusionism)。传播论与进化论一样,对历史的解释具有浓厚的臆想性特征。然而,持传播论观点的人类学家,大多不认为人的历史状况存在任何令今人乐观的那一“进步性”。进化人类学家的历史叙事,大多依据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时间线索展开;而传播人类学家则倾向于运用相反的规律来解释资料,他们认为,那些存在于近代世界的各种“野蛮文化”,乃是古老的“文明”衰变的后果。这也就是说,传播人类学的最极端的观点是,文化史研究必须把握文明古国的文化精髓在其从中心向边缘传播的过

程中逐渐滥觞的线索。传播论有“多中心主义”和“单中心主义”之争。“多中心主义”主张曾经有过多古代文明,其构成的文明体系和区域关系也是多元化的;而“单中心主义”则主张最古老、最辉煌的文明,曾经只有一个(如埃及),其他文明都是由它衰变而成的。

颇有趣味的是,进化人类学的原则同时长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两种相互对垒的阵营中。在西方人类学中,这种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一度有复兴的趋势。传播人类学曾于20世纪初期得到了英国功能主义者的一部分接受,在这同一时代,也曾被美国人类学家改造为抵抗进化人类学的武器。进化论和传播论分别从历史的时间线索和文化的空间分布“临摹”出来的文化格局,在立论上时常相互对反、相互矛盾。相对而言,传播论对于20世纪西方人类学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它对于“文明衰退”的考古学式思考是具有文化反思力量的,由此也影响了数代人类学家。然而,在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中,这两种作为思想体系的学说却更多地面临着批判和反思。20世纪的人类学家拒绝接受这两种理论的“历史臆想性”,认为这两种理论带有对非西方文化的偏见,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人类学当中的表现。

1914年—1945年

对“野蛮人”的文化模式中蕴涵的理想因素,进化人类学家的著作早已给予关注。到1914—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学家对这些因素的关注程度急剧上升。这个变化与20世纪上半叶西方内部的政治经济变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与19世纪不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内部出现了利益分化,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日益增多,19世纪的“国际联盟”和帝国主义,逐步为20世纪发达国家之间的“战国局面”所取代。在这样的状况下,西方社会思想界对自身文明曾经拥有的自信心一时失去了

根基。因而,对“西方中心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和“政治文明”信条的反思,成为这个时代人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在1914年—1945年之间,西方人类学研究不约而同地注重从“野蛮人”生活“朴实”而“原始”的面貌中探索共同体内聚力(cohesion)的生成原理。生活在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三个人类学家,在探索共同体内聚力生成原理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在英国,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分别从制度与个人需要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局部与社会结构整体的关系展开研究。功能主义者认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求索“野蛮人”的文化丧失其现实存在理由的过程,而是为这些文化形态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合理性提供解释。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别,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作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工具而存在的理由。所有的文化形态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们满足了不同的人群对于生存、社会团结和尊严的需要。结构—功能主义者注重研究社会结构,将文化当成是体现社会结构总体形态的“形式”来研究。这一派的人类学家主张,人类学研究应当成为一种“比较社会学”,从不同社会形态的结构与功能的比较研究中,对有关推动社会一体化的内聚力进行一般概括。在理论解释方面,结构—功能主义者特别注重社会内部的构成部件结合为一个结构整体的原理。

在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30多年时间里,人类学在年鉴学派社会学原则的指导下展开研究(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也受此影响)。年鉴学派社会学关于宗教乃是社会内聚力之核心动力的观点,影响了那个时代法国人类学的所有研究。这种人类学研究特别注重从非西方、非工业化社会(包括文明社会)探究将不同个人和不同群体联系起来的纽带,特别注重探究围绕“礼物”和“礼仪”进行的交换的社会意义。对于西方近代思想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这个学派

从一开始就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此外,对于 19 世纪西方文明中商品市场对于构造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关系和导致社会内部瓦解的“双刃剑”作用,这个学派所达到的认识也最为深刻。

在美国,在接近于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引导下,人类学彻底舍弃了进化论,进入一个“历史具体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时代。在具体民族志研究上,美国人类学特别注重语言和物质文化的研究,深受德国传播论和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对进化论中包含的“物质决定论”和种族人类学中包含的“生物决定论”持极端鄙视态度。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物质和生物决定论,这个时期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多采纳“认识决定被认识的事实”的观点,由此延伸开去,他们也主张不同文化共同体的语言—观念体系决定了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对于社会内聚力,美国人类学家向来缺乏足够的兴趣。他们采用美国化了的德国文化论,来阐述文化决定个人—群体行为趋向的论点。这种论点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将文化系统当成共同体的内在一致性来看待。美国人类学从被研究的“野蛮人”的“局内人”角度来判断文化价值,达成的理解也接近于社会内聚力的理解。美国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与英国和法国的“普遍主义”论调,构成了鲜明的差异。对于这个学派的普及化,“文化与人格”学说曾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在克服种族主义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了一种无助于认识人类共性的极端化文化差异论。

1946 年—1970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内部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西方内部,美国对于西方社会和社会科学整体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此前的社会科学“欧洲中心主义”向“美国中心主义”转变。发达国家分为战胜国与战败国。在西方以外的地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寻求民族—国

家主权的运动愈演愈烈,并在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获得制度化支持。接着,一大批“新国家”随之产生。“三个世界”的论断比较精确地体现了这 20 多年间的世界格局。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里,西方人类学出现了新的危机。殖民地脱离殖民地宗主国,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了限制。尽管第三世界人类学家继承了西方人类学的部分遗产,但他们对那种将他们当成“原始人”或“古代人”的做法极为反感。为了使人类学与自己的国家一样具有民族自主性,他们不仅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人类学加以抵制,也力求创造一种适合于自己国家的新人类学。面对世界格局的这些变化,西方内部的人类学也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在英国人类学界,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主张得到了部分的修正。从人类学学科的定位来看,这个时期出现了将人类学与“科学”区分开来的人文主义主张。为了排除人类学的知识霸权色彩,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学家从事的工作与文化格局之间的关系,主张将人类学视为“人文学”之一门,以此来表明人类学在跨文化理解中的重要意义。到 20 世纪 50 年代,人类学也出现了重视历史过程和社会冲突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英国人类学家全面反思了他们的前辈在想像非西方文化时忽视的文化动态性和文化内部多元性。在美国人类学界,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形态也遭到了批评。人类学家的眼光不仅从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研究扩大到海外研究,也对人类学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人类学家提出了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等学说,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文化演进中一致与差异、经济生活与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随着农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也开始有人类学家深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理论。在法国人类学中,法国传统的社会结